

《红岩》与中国当代国家文学

周 晓 风

(重庆师范大学 文学院,重庆 401331)

摘 要:中国当代国家文学的建构,既是现代民族国家文学发展逻辑的必然选择,同时也是中国当代文学特殊性的体现,但其体制化资源却主要来自前苏联。从上世纪20年代到30年代,俄共(布)中央委员会和联共(布)中央先后发布了《关于党在文学方面的政策》的决议、《关于改组文艺团体》的决议,并于1934年8月主持召开了第一次全苏作家代表大会,奠定了前苏联国家文学的基础,展现出现代民族国家语境下新的国别文学发展愿景及其发展路径,对我国当代国家文学的形成产生了重要影响。重庆作家罗广斌、杨益言的长篇小说《红岩》的创作过程,在某种意义上可以看作是中国当代国家文学构建的一个代表和缩影,并为新中国国家文学提供了创作范式,创造了成功经验。

关键词:当代文学;国家文学;长篇小说;《红岩》

中图分类号:I0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0429(2020)04-0023-07

doi:10.19742/j.cnki.50-1164/C.200403

—

1961年12月,中国青年出版社在经过了三年多时间的精心打磨之后,隆重推出了署名罗广斌、杨益言创作的长篇小说《红岩》。当时,无论是该书的作者、编辑,帮助书稿修改的著名作家,以及为该书的写作和出版提供了重要资源和帮助的各级党委政府部门,都没有意识到,出自他们之手的长篇小说《红岩》,将成为中国当代发行量最大的“党史小说”(林默涵语),以致成为中国当代国家文学的标志性作品和所谓红色经典作品。

所谓国家文学,按照一些学者的说法,是文学发展到20世纪现代民族国家兴起之后的一种重要文学现象。德国作家歌德1827年1月曾经在跟爱克曼的谈话中提出了“世界文学”的假设。在歌德看来,“民族文学在现代算不了很大的一回事,世界文学的时代已快来临了。现在每个人都应该出力促使它早日来临”^{[1]113}。但究竟何为世界文学以及民族文学怎样走向世界文学,歌德在他的时代似乎还无法提出清晰的路径。在相当长一段时间里,世界文学只能被想象成一种超越民族文学的更大范围的文学,世界文学的形成则被解释成一个从民族文学到超越民族文学的世界范围的文学,而且似乎是一个自然的和必然的过程。然而20世纪前半叶,前苏联文学却提出了一种新的文学发展模式——国家文学。前苏联学者A.卡拉干诺夫在1947年第11期《苏联文学》上发表了一篇题为《苏联文学三十年:国家与文学》

收稿日期:2019-11-18

作者简介:周晓风(1957—),男,文学博士,重庆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研究方向:现代文学。

基金项目:2016年度重庆市社科规划重点项目“重庆文艺人才培养存在的问题及对策研究”(2016ZDWT48)。

的文章,明确提出了国家文学的概念。该文后来被翻译成中文发表于1948年8月出版的《中苏文化》杂志第19卷4-5期合刊。文中写道:“苏联文学已有三十年历史,它光荣地拥有着丰富的成就,这些成就在理论与实际方面都已经使世界文学丰富起来。这三十年最显著而且最有益的结果之一,便是国家与文学相互关系问题之新的和空前的解决。”^[2]什么是这种“国家与文学相互关系问题之新的和空前的解决”呢?作者在文章中提到1925年7月公布的俄共(布)中央委员会《关于党在文学方面的政策》的决议。其中的核心内容是该决议第六条所强调的执政的无产阶级政党对于包括文学在内的文化领导权:“无产阶级应当保持、巩固、日益扩大自己的领导,同时要在思想战线许多新的区域中也占有适当的阵地。辩证唯物论向完全新的领域(生物学、心理学、一般自然科学)渗透的过程,已经开始了。在文学领域中夺取阵地,也同样地早晚应当成为事实。”^[3]⁴⁻⁵该决议同时还提到决议产生的历史背景,一方面是苏联新经济政策的实施“造成了文化的要求和需要的巨大增长”,社会进入了文化革命的阶段;另一方面,新经济政策也带来新资产阶级产生和壮大,造成“一部分新旧知识分子对于这种资产阶级的必然的、虽然最初未必是自觉的向往,以及这种资产阶级的新的思想代表之不断从社会深处化学式地分泌出来。”“因此,正如一般阶级斗争在我国没有停止一样,阶级斗争在文学战线上也没有停止。在阶级社会中没有而且也不可能有中立的艺术,虽然一般艺术的阶级性,尤其是文学的阶级性,其表现形式较之——比方说——在政治方面是更加无限地多种多样。”^[3]⁴正是这种阶级斗争仍然存在的社会背景,以及无产阶级作家在阶级斗争中需要进一步取得对于包括文学在内的文化领导权的需要,促使决议要求“党应当帮助这些作家给自己赢得掌握这个领导权的历史权利。”这便是前苏联提出“国家文学”的主要背景。值得注意的是,该“决议”虽然强调了无产阶级作家对于苏维埃政权文学事业的领导权,但仍然明确提出,“在正确地认清各种文学流派的社会阶级内容时,党决不能偏袒文学形式方面的某一派别而使自己受到束缚。”“党应当主张这方面的各种集团和派别自由竞赛。用其他任何方式来解决这个问题,都不免是衙门官僚式的虚假的解决。以指令或党的决议使某一集团或文学组织对文学出版事业实行合法的独占,同样也是不容许的。党虽然在物质上和精神上支持无产阶级文学和无产阶级农民文学、帮助‘同路人’等等,却不能听任即使在思想内容上最为无产阶级的任何集团实行独占,因为这首先就会毁灭无产阶级文学。”^[3]⁸然而到了上世纪30年代,在斯大林主导下产生的联共(布)中央《关于改组文艺团体》的决议却又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1925年7月公布的俄共(布)中央委员会《关于党在文学方面的政策》的决议。1932年4月23日,联共(布)中央发布了《关于改组文艺团体》的四条决议意见,并在四条决议之前专门作了一段说明:“中央确认:最近几年来,在社会主义建设重大胜利的基础上,文学和艺术不论在数量上和质量上都获得了巨大的成长。几年以前,当文学中还存在着新经济政策初期特别活跃的异己分子的很大影响,而无产阶级文学干部则还很薄弱的时候,党曾用一切办法帮助成立和巩固文学艺术方面的独立的无产阶级组织,目的是在于巩固无产阶级的作家和艺术工作者的阵地。现在,当无产阶级文学艺术干部已经成长,新的作家和艺术家已经从工厂和集体农庄中出现,现存的无产阶级文学艺术团体(“伏阿普”“拉普”“拉普姆”等等)的范围便显得狭窄,并且阻碍着艺术创作的重大发展。这种情况所造成的危险,就在于这些团体已经从一种充分动员苏联作家和艺术家参加社会主义建设的手段变成培植狭隘的小圈子的手段,既脱离了当前的政治任务,也脱离了一大群同情社会主义建设的作家及艺术家。因此必须适当地改组文学艺术团体并扩大其工作基础。根据这种情况,联共(布)中央决议:一、取消无产阶级作家团体(“伏阿普”“拉普”);二、把一切拥护苏维埃政权纲领和渴望参加社会主义建设的作家团结起来,成为一个其中有共产党党团的单一的苏联作家协会;三、在其他各种艺术方面也实行同样的改革;四、责成组织局拟就实行这个决议的办法。”^[3]¹¹上述两个重要决议和稍后第一次全苏作家代表大会的召开以及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创作方法的提出,实际上从体制机制上奠定了前苏联国家文学的

基础,展现出现代民族国家语境下新的国别文学和世界文学发展愿景及其发展路径。前苏联国家文学的发展不仅从指导思想对我国当代国家文学的形成产生了重要影响,而且提供了可资借鉴的体制机制模式。

中国当代文学自1949年7月在北平召开第一次全国文代会起,就因为诸多历史的和现实的缘由表现出强烈的建构新中国国家文学的意愿。中国当代国家文学的建构,既是现代民族国家文学发展逻辑的必然选择,同时也是中国当代文学特殊性的体现,其中最主要的一点就是,中国当代文学已经不再是历史上的那种自发的自由的文学,也不是中国作为一个现代国家草创初期各种文化和文学力量在限制和竞争中发展的文学,而是一种高度统一的社会主义国家文学,是作家的创造性劳动与国家的体制性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其基本特征就是要求文学秉持国家意识形态,成为国家立场的代表。吴俊教授曾特别指出中国当代文学作为国家文学的理由,一方面,“当代中国文学系由国家权力及其意识形态所全面建构,是自觉意义上的国家意识形态构成,而且也是指当代中国文学系由国家权力及其意识形态所全面支配,是被充分整合、纳入到国家权力范畴之中的意识形态。”另一方面,“当代中国文学不仅被完全赋予了国家意识形态的表现或代言的职能与使命,而且它还是充分自觉地履行了这种表现或代言的职能与使命。”因此,中国当代文学在其基本表达方式或形态方面,特别是在其价值诉求和价值归属上,不能不主要属于国家文学。^[4]如果说新中国成立前夕召开的第一次全国文代会还只是初步提出了中国当代国家文学的思想方略和组织架构,稍后开展的一系列文艺界思想批判运动和组织措施,以及对于新的人民文学创作的倡导,则在更为深入和更为内在的层面推进了中国当代国家文学价值立场、审美范式和生产方式的逐渐形成。长篇小说《红岩》的创作过程,在某种意义上可以看作是中国当代国家文学构建的一个代表和缩影。

二

如同《红岩》中的传奇故事一样,长篇小说《红岩》的写作和出版本身,也经历了一个近乎于传奇的发展历程。一般认为,长篇小说《红岩》的写作大体上经历了三个阶段。《红岩》故事写作的第一个阶段可称作个人回忆写作阶段,包括《红岩》故事早期的几位作者同时也是重庆解放前夕“11.27大屠杀”幸存者的罗广斌、刘德彬、杨益言等在重庆解放初期的回忆文章和宣讲提纲,以及他们对渣滓洞白公馆大屠杀其他幸存者的回忆文章的整理。其中较有代表性且与长篇小说《红岩》有较为密切关系的,有罗广斌、刘德彬等在1950年编写的《如此中美特种技术合作所——蒋美特务重庆大屠杀之血录》。该书当时实际上属于内部出版物,收录多篇相关回忆文章,作者除罗广斌、刘德彬外,还有时为重庆国民公报记者李宗禄。该书作者署名则为“重庆市各界追悼杨虎城将军暨被难烈士筹备委员会编”。此外还有罗广斌、刘德彬和杨益言三人编写并由新华书店华南总分店1950年11月正式出版的《圣洁的血花》。根据钱振文博士的研究,最早对重庆解放前夕发生的国民党集中营大屠杀事件进行个人回忆性书写的,是大屠杀的幸存者之一任可风的《血的实录——记11.27瓷器口大屠杀》(原载1949年12月6日重庆《大公报》第四版)、钟林的《我从渣滓洞逃了出来》(1949年12月29日至1950年1月1日重庆《国民公报》连载),以及杨祖之(杨益言)的《我从集中营出来——瓷器口集中营生活回忆》(1949年12月5日至12月16日重庆《国民公报》连载)等。钱振文注意到,这些回忆文章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即都是以第一人称的视角叙述故事,是相当典型的个人自发的痛苦记忆表达。而且,“在战火硝烟刚刚弥散之际,他们这些在组织机构之外的写作活动显然还没有受到意识形态的严格控制,从而显得生鲜和粗粝,与在此之后《红岩》作者参与对大屠杀的叙述相比较,

无意识地暴露出大量不符合政治需要的‘历史事实’。”^{[5]20}而在此之后,当罗广斌、刘德彬和杨益言受组织的委派和出版单位的邀请,编写有关渣滓洞、白公馆大屠杀回忆材料,才开始逐渐表现出代表新成立的国家政权对历史叙事的规范化特点,换言之,写作开始表现出国家立场。这既是《红岩》故事从个人记忆到国家文学转化的第一步,也可以说《红岩》故事的写作进入了第二个阶段,或者可以称作国家记忆纪实文学阶段。

所谓国家记忆纪实文学,是指这一阶段的写作由于新的国家意识形态建构以及国家出版机构的介入,使这一阶段的写作具有了较为自觉的国家立场的追求。因此,《红岩》故事在第二个阶段的写作虽然在“纪实”这个基本特点上与此前的个人记忆写作保持了一致性,但在写作方式和写作效果等方面与前一个阶段有了明显的区别。这里需要简要提及催生长篇小说《红岩》的重要出版机构中国青年出版社。中国青年出版社是一家隶属于共青团中央的出版机构,其前身是成立于1950年的青年出版社。1953年青年出版社与开明书店合并,更名为中国青年出版社至今。由于中国青年出版社是一家直属共青团中央领导的全民所有制事业单位,其国家机构的身份和全国性影响是不言而喻的。更重要的是,中国青年出版社自成立伊始,不仅能够很好地把握国家的出版方针,而且拥有一批具有强烈社会责任感和专业眼光的编辑人,出版了以“三红一创”为代表的一大批中国当代文学标志性作品,成为黄发有所说的“英雄生产线”^[6]。中国青年出版社第一次向《红岩》故事作者约稿是在1957年4月。据长篇小说《红岩》初版本责任编辑张羽回忆,1956年夏天,中国青年出版社为了编辑对青年进行革命传统教育的读物,在第二编辑室(即文学编辑室)里建立了传记文学组。创办了一个新型刊物《红旗飘飘》。“创刊伊始,我们制订了一个包括著名烈士和英雄人物的一百多人的回忆录或传记名单,向四方征稿。当我们正在安排第二期稿的时候,收到四川省长寿县读者赵山林的一封来信。信中反映了四川群众的意见:他们听了罗广斌同志介绍解放前‘中美特种技术合作所’的血录,受到很大教育,希望中国青年出版社收集材料,‘通过写小说的形式出版发行’,以便收到更好的效果。”^[7]正是这封读者来信,促成了中国青年出版社向罗广斌的第一次约稿。“我们在制订选题计划中,本来就有一项是请罗广斌写《江竹筠传》。现在,读者推荐的题材和作者,正是我们要找的线索。他所讲的内容和我们原拟的选题相比,涉及的场面、人物更加丰富。因此,我们除向这位热情的读者回信致谢外,当即由王扶另拟一信,向罗广斌约稿,请他写一篇‘中美合作所血录’回忆录。半年以后,收到由罗广斌、刘德彬、杨益言三位作者根据报告整理而成的回忆录《在烈火中得到永生》。”^[7]这就是1958年2月发表在《红旗飘飘》第六集上的纪实文学作品《在烈火中得到永生——记在重庆“中美合作所”死难的烈士们》。这也是《红岩》故事第一次以回忆录的方式与全国读者见面。1959年2月,中国青年出版社又将修改后的《在烈火中得到永生》作为重点图书出版了单行本《在烈火中永生》,使《红岩》的故事在全国广为传播,并被改编成电影产生了巨大影响,成为新中国“红色经典”的代表性作品之一。关于这部作品,其时的责任编辑张羽曾经在“编辑报告书”中这样写道:“重庆解放前夕,敌人逃跑时,把被囚的革命志士大部屠杀,最后,放火烧了集中营,企图毁尸灭迹。罗广斌和刘德彬就是在大屠杀时冒着生命危险逃出来的。这部稿件就是他们以亲身的经历,揭露‘中美合作所’的滔天罪行;同时通过革命志士的具体斗争,反映革命者英勇顽强、至死不屈,以及他们的乐观主义精神。这是一部很有教育意义的作品。”^[7]因此,从《在烈火中得到永生》到《在烈火中永生》的出版过程,不仅使《红岩》故事受到高度关注,并且极大满足了新中国成立初期新的国家意识形态构建需要。读者、国家权力机构以及意识形态部门不约而同提出了深化《红岩》故事写作的要求,从而推动《红岩》故事从“回忆录”向长篇小说的发展,《红岩》故事的写作也由此进入第三个阶段即长篇小说创作阶段。

《红岩》故事的长篇小说创作阶段对于《红岩》故事后来所产生的巨大影响具有决定性作用,同时也是中国当代国家文学在此获得成功的关键所在。因此,《红岩》故事的长篇小说创作阶段在《红岩》故事的写作史上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其中的关键环节是文学创作过程中国家权力机构和意识形态部门作为文学生产体制性要素的深度介入,为长篇小说《红岩》的写作和出版提供了具有关键意义的方向引领和资源保障。1958年10月,时任共青团中央常委、中国青年出版社党组书记、社长兼总编辑的朱语今代表中国青年出版社到四川组稿,专程去重庆会见了时任中共重庆市委常委、市委组织部部长肖泽宽。朱语今抗战时期曾在中共南方局工作,对《红岩》故事中许多人物经历都比较熟悉。他不仅在与肖泽宽会见时动情地建议中共重庆市委重视有关狱中斗争的文学创作,宣传先烈风骨精神,向青少年进行革命斗争传统教育,而且在杨益言陪同下还专程到重庆长寿湖农场与在那里劳动锻炼的罗广斌、刘德彬见面,鼓励他们“破除迷信,解放思想”,写好长篇小说《红岩》。中国青年出版社在此后长篇小说《红岩》的写作和修改过程中,还多次约请作者进京改稿,召开作品研讨会,为小说出版提供大量人力物力财力支持。重庆方面,肖泽宽本身是原川东地下党老同志,20世纪30年代至40年代在中共南方局领导下从事地下斗争,既与朱语今熟悉,也熟悉狱中许多革命志士的斗争事迹。因此,“肖泽宽十分赞同朱语今建议,立即向当时的重庆市委第一书记任白戈、书记李唐彬报告。市委很重视,为此李唐彬和肖泽宽开会研究,提出把有关狱中斗争的长篇小说的创作‘当作一项严肃的政治任务来考虑’,会上确定肖泽宽代表市委组织并领导小说的创作。”^[8]此后,肖泽宽代表中共重庆市委密切关注和指导长篇小说《红岩》的创作,不仅为创作人员请创作假,而且把几位作者专门抽调出来集中精力搞创作,还提议并经市委同意,准许小说创作人员到公安部门查看当时控制极严、轻易不让人接触的绝密级敌特档案,提审在押敌特人员,为小说创作提供了难得的宝贵素材。在作者写出初稿后,肖泽宽又亲自主持座谈会讨论作品得失,并且出面邀请著名作家来渝指导作者修改作品,支持几位作者到北京改稿,为作品的成功不遗余力。像中共重庆市委这样以地方党委的身份出面组织文学创作,并且大量运用国家体制资源为文学创作提供服务,既为文学创作提供了无可置疑的合法性,也为文学生产的有效运行给予了生产要素的保障,不仅为长篇小说《红岩》的创作打上鲜明的国家文学标识,而且创造了独特的共和国文学生产模式。这一切在新中国成立之初是没有先例的,也取得了相当成功的效果。因此,可以毫不夸张地说,长篇小说《红岩》的创作和出版,为新中国国家文学提供了创作范式,创造了成功经验。

如果说上述通过运用国家体制资源为文学创作提供生产保障还只是为国家文学生产提供某些外在条件的话,运用国家意识形态引领文学创作方向则可以看作是中国当代文学生产体制性要素发挥重要作用的另一个方面,而且是更为重要但也是更为困难的一个方面。其重要性在于,文学创作从根本上来讲是一种精神生产,精神引领在文学创作的审美评价中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表现在作品题材的选择,主题的倾向,以及人物形象的塑造等方面。过去常常讲的世界观对文学创作的重要作用,主要就是讲的这个问题,其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但是还应该看到,过去讲世界观对文学创作的重要作用也有的讲得不够准确或者说不够科学。因为文学生产的意识形态引领并不是一个简单的事情,而是具有相当的复杂性,存在某些特殊的困难。其复杂性和困难性在于,文学创作从根本上来讲是一种审美活动,必须遵循审美的规律。这就是说,文学创作中的思想引领严格说来不宜直接以思想方式表现为作品的主题或人物的思想倾向,那样只能导致创作中的“主题先行”。这正是恩格斯批评的“席勒化”。进一步说,文学创作中所有的思想引领资源和作家的生活积累等条件如果不能内化为作家的情感体验和审美认知,文学

创作就无法获得艺术创造的成功。因此,国家文学如果要取得成功,必须要做到国家思想立场和审美艺术规律的辩证统一。正是因为如此,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一方面明确提出,为人民群众服务的文学艺术,必须从根本上把思想立场转到人民大众方面来;另一方面,毛泽东在讲话中还特别指出,马克思主义只能包括而不能代替文艺创作中的现实主义,说的就是这个道理。因此,尽管中国当代国家文学的产生具有历史必然性和历史合理性,但国家文学创作取得成功并且能够传世的作品并不多见。一个重要原因,就在于体制机制乃至正确的思想引领等因素,并没有有效转化为创作中作家的情感体验和审美创造,国家意识形态引领文学创作这个关键环节在一些时候未能得到审美落实,有时甚至只是所谓“三结合”创作模式的简单套用,即所谓领导出思想,群众出生活,作家出技巧。相比之下,作为国家组织行为的长篇小说《红岩》的创作则因为领导者和创作者、思想引领和艺术创造等因素有机结合,使小说创作获得了成功,也为中国当代国家文学提供了难得的成功经验。这里特别值得提到的是,长篇小说《红岩》在各方面的支持帮助下,于1959年8月完成初稿。但有关方面读后反响并不好,提了很多意见,包括“低沉压抑”“满纸血腥”“缺乏革命的时代精神”等,作者一时也陷入迷茫之中。中国青年出版社和重庆有关方面并没有简单要求作者按照当时的主流话语修改作品,而是给予了热情关怀和鼓励,采用了一些更符合艺术创作规律的方式帮助作者领会文学的时代要求与艺术创作的关系。据杨益言回忆,“隔了几个月,中国青年出版社却热情约我们到北京讨论初稿。重庆市委安排我们去北京参观十大建筑,开阔眼界。1960年夏,罗广斌和我终于成行,到了北京。没有想到,我们到京以后,却被一件意外的事吸引住了。那时候,中国历史博物馆正在内部展出毛主席指挥解放战争的全部电报手稿。我们一走进展览馆,就立刻发现:原来,小说里缺少的一个重要东西,就是我们对解放战争的全局缺乏了解,心里不踏实,因而不敢放手描写那个时期瞬息万变、错综复杂的敌我斗争。一看全局,那么尖锐复杂、变幻无穷、规模空前的战局,毛主席、党中央尚可瞭若指掌,指挥若定,自己的心境顿觉豁然开朗,觉得小说中再复杂的斗争也可以组织了。”^[9]《红岩》书名的修改也是神来之笔。长篇小说《红岩》在此前的写作中,一直都是使用作者早先所起的《钢禁的世界》这个书名。直到小说最后修改定稿时,才被确定为《红岩》。该书名不仅格调高昂,而且以隐喻的方式表达出渣滓洞白公馆的斗争与红岩村(中共南方局所在地)的关系,受到各方面一致认可。当然,由于历史语境的局限,1961年12月出版的长篇小说《红岩》初版本仍然存在一些局限和遗憾,包括不少研究者指出的小说中存在的一些重要史实错讹,以及李扬在《50——70年代中国文学经典再解读》一书中指出长篇小说《红岩》对中国当代文学体制化生产要素运用存在某些简单化倾向等。其中最大的遗憾是《红岩》故事的另外一位重要写作者刘德彬,在1958年因为被认为犯了右倾错误,被人为地取消了参与作品修改和最后署名的权利,使这位“红岩”之子抱憾终生。这之中也包含了中国当代国家文学理应总结的若干教训。

由此我们看到,长篇小说《红岩》的成功的确不是偶然的。长篇小说《红岩》自1961年12月正式出版以来,重印了上百次,发行量超过1000万册,并被翻译成英、法、德、日、朝等多国文字。《红岩》影响了中国当代几代人,至今仍在发挥生活教科书的作用。这或许正好道出了长篇小说《红岩》作为中国当代红色经典和国家文学典范作品的意义所在。

[参 考 文 献]

- [1] 歌德. 歌德谈话录[M].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78.
- [2] A. 卡拉干诺夫. 苏联文学三十年:国家与文学[J]. 中苏文化,1948(8).
- [3] 苏联文学艺术问题[M]. 曹葆华等,译.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53.

- [4] 吴俊. 中国当代“国家文学”概说——以《人民文学》为中心的考察[J]. 文艺争鸣, 2007(2).
- [5] 钱振文. 《红岩》是怎样炼成的[M].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1.
- [6] 黄发有. 中国青年出版社与“红色经典”[J]. 当代作家评论, 2014(4).
- [7] 张羽. 我与《红岩》[J]. 新文学史料, 1987(4).
- [8] 李彦一. 镌刻在红岩上的足迹——肖泽宽与重庆[J]. 红岩春秋, 2003(4).
- [9] 杨益言. 关于小说《红岩》的写作[J]. 新文学史料, 1980(2).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Red Rock* and Contemporary Chinese National Literature

Zhou Xiaofeng

(College of Chinese Literature, Chongqing Normal University, Chongqing 401331, China)

Abstract: The construction of Chinese contemporary national literature is not only the inevitable choice of the development logic of modern national state literature, but also the embodiment of the particularity of Chinese contemporary literature. From the 1920s to the 1930s, the central committee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Russia (republic of Russia) and the central committee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Russia (republic of Russia) successively issued resolutions on *the Party's Policy on Literature* and on *the Reorganization of Literary and Artistic Organizations*, and presided over the first all-soviet writers' congress in August 1934, laid the foundation for the literature of the former Soviet states. It shows the development vision and path of the new national literature in the context of modern nation-state, which has an important influence on the formation of contemporary national literature in China. The creative process of *Red Rock*, a novel written by Luo Guangbin and Yang Yiyan from Chongqing, can be regarded as a representative and epitome of the construction of Chinese contemporary national literature in a sense, and provides a creative paradigm and a successful experience for new China's national literature.

Keywords: the contemporary literature; national literature; full-length novel; *Red Rock*

[责任编辑:左福生]